

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义

李 凡 夫

湖北人民出版社

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义

李凡夫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批判徐悲鸿的修正主义

李凡夫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1 $\frac{1}{2}$ 印张·38,000字

1968年9月第1版

196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统一书号: 2106·31

定 价: (7)0 15元

B29
Z32

前 言

我們和徐懋庸之間的斗爭已經有相当长的時間了。我們很早就发现徐懋庸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反馬克思主义的宣傳。过去我們总是希望徐懋庸能放弃他的錯誤立場，站回党的立場上来，因此我們对他的批評与揭露是不彻底的。后来，徐懋庸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和各种文章，修正主义的观点愈来愈明显，才不能不对他进行严重的斗爭。事实教育我們，对有系統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人是不能姑息的，只有加以彻底的揭露，才能使他不能再去迷惑別人。这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原则性的斗爭，在这场斗爭中，我們許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得到了鍛炼和考驗，同时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这本小册子收集的文章，有三篇是在徐懋庸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前写的（“評徐懋庸的几篇杂文”是由两篇文章合并起来的），当时文中还对徐懋庸以“同志”相称，現在重印时把“同志”两字刪掉了；最后一篇是我在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行批判党内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大会上的发言稿，后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过。头一篇則是在批判大会后写的。

徐懋庸放出的毒是非常大量的，一年之間就写了二三十万字的文章，我写的批判文章在数量上不及他发表的十分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同志写了不少很好的批判文章，但應該說，对徐懋庸修正主义的批判还是不够的。对其他右派分子的謬論从学

术观点上来批判也做得不够。因此，我們还有責任对一切资产阶级的謬論进一步加以批判。我們要拔掉所有资产阶级的白旗，树起无产阶级的紅旗。

作 者

1958年6月..

目 录

前言

駁斥徐懋庸的修正主义的謬論.....	1
評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論.....	21
評徐懋庸的几篇杂文.....	26
評徐懋庸的“大学里的右派”.....	32
徐懋庸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36

駁斥徐懋庸的修正主义的謬論

修正主义思潮是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險。修正主义在中国則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武器。用修正主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克思主义，徐懋庸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懋庸的修正主义观点，很早就有所表现，曾經屢受批評而屢教不改。两年前，我們与徐懋庸展开过一場激烈的斗争，对他的一系列的錯誤理論和表现形式都作了比較系統的批判。徐懋庸在鉄的事实面前，也承認过一些錯誤；但不久又翻案了，不但翻案，而且他的反动理論还有很大的“发展”。徐懋庸在大鳴大放期間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用修正主义作为理論武器，用杂文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猖狂地向党和社会主义放出了大量的毒箭，几个月間写了二十余万字，百篇以上的文章。他的“小伙伴”們大为叫好，并加入了他的“哲学合作社”，追随徐懋庸，一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党内有一些不坚定的和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在他們的猖狂进攻前面，完全丧失了警惕，有的随声附和，有的寄予同情，有的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因之，徐懋庸的毒草曾經有过一定的市場，他的杂文在国内十多个报纸刊物上大量登載，他自己也得意忘形地說：“得到了編者和讀者的鼓励。”党內的右派分子，比起党外右派来，其危害性更大，因为他們都是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还往往以“老党员”、“老作家”、“理論工作者”的面目出現。他們还善于自我吹嘘和互相吹嘘。所以，他們能够在群众尚未認識他們的真面目以前，

浮屠一些人。現在，徐懋庸的丑惡面目已完全被揭穿，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觀點已進行了批判，但對他在理論上的修正主義觀點，還須作進一步的揭露和消毒。我們不但要駁倒徐懋庸，更重要的是要肅清他的修正主義的思想影響。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挂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个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这个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徐懋庸的修正主義，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派最好的助手，是章伯鈞、章乃器這類人最好的助手，他為他們提供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對徐懋庸的修正主義加以徹底的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義，是表現在多方面的，他在科學院寫的“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一篇專題論文中，公然提出要“重新審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部內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他是用盡一切力量來實踐這個意圖的。在這裡，不可能對所有問題都談到，我只想談談徐懋庸在哲學上的幾個重要方面是如何“修正”馬克思主義的。

一、否定世界觀的階級性和党性

徐懋庸很早就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党性原則，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階級性和党性，提倡超階級的謬論。更早的

不去談它，徐懋庸在1951年5月發表的“實踐論——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的一本小冊子中，就暴露了他的唯心主義和超階級的觀點。他怎樣解釋這本小冊子的標題呢？徐懋庸說：“對於社會全體成員講來，認識社會現象及其發展的規律，就是‘知己’；認識自然現象及其發展規律，就是‘知彼’；根據對自然和社會的規律性的認識而進行生產和革命的實踐活動，就是‘戰’；根據正確的認識而實踐的結果，改革了社會，發展了生產，提高了生活，這才叫做‘勝’，就是達到了認識和實踐的目的。”在這一段文章里，最少就有兩個原則性的錯誤。第一，徐懋庸把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發展規律兩種客觀規律對立起來，看作敵我關係或主客觀關係，把認識前者叫做“知己”；而把認識後者叫做“知彼”。這是明顯的唯心主義的表現。第二，他號召“社會全體成員”去“戰”，去進行“革命”，把現代社會看作沒有階級的社會，完全否定了階級鬥爭的原則。徐懋庸這種謬論，並不是偶然的措詞上的錯誤，他的唯心主義和超階級的論點是貫徹在他整本小冊子以及其他許多文章中的。

兩年前我們曾經與徐懋庸爭論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矛盾的階級根源問題，也就是世界觀有沒有階級性和黨性的問題。徐懋庸說：“為什麼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因為有了人才有的。如茶杯、狗、猴子，就沒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當時徐懋庸是針對我們認為世界觀有階級性和黨性來說的。我們認為，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有離開階級性和黨性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而主觀唯心主義和詭辯學說則是剝削階級特別是現代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階級社會里，世界觀有沒有階級性和黨性，是我們與徐懋庸爭論的焦點。徐懋庸為着否定世界觀的階級性和黨性，否定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在階級社會里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他一再強調說，世界

觀是“有了人才有的”。是不是在世界上有了人類，如在“北京人”的時代，就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呢？我們知道，從遠古時候起，人們就思索靈魂與外界關係，即主客觀關係的問題；但是作為研究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哲學，特別是哲學上兩條路綫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則是从有了階級社會，即奴隸社會才產生的。哲學是隨着社會生產、自然科學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並不是世界上出現了人類立刻就有哲學。再者，依照徐懋庸的說法，一切有關社會現象和社會意識的問題都可以用“有了人才有的”這句話來答复了。比如說：為什麼會有人民與右派之間的矛盾？為什麼會有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為什麼會有我們與徐懋庸之間的鬥爭？徐懋庸都可能用同一句話來答复：“有了人才有的。”但是這樣答复，等於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我們對這些問題，只有作具體的階級分析，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但是徐懋庸為着模糊人們的認識，他是反對作具體的階級分析的。他到科學院後還寫了一篇“‘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是誰提出來的”，反復強調說：“世界上有了人，有了思維，才發生這一系列的問題。這確實不是什麼‘玩笑’，而是應該‘莊重其事’地交代明白的一個極其簡單的自然科学常識。”徐懋庸說別人缺乏自然科学常識；但這種常識，我們已經交代得清清楚楚，我們早就承認有了人，才有徐懋庸，才有徐懋庸的思想。但是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主要是另外一種常識，即社會科學的常識，這種常識，徐懋庸不是沒有，而是別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加以否定。徐懋庸當別人提到世界觀有階級性和党性時是極為反感的，他說：“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階級性’和‘党性’是強極了，但是，我以為他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從他的批判，使人可以理解為沒有人類的時候，也是有哲學的，沒有思維的時候，也是有‘思維

‘存在的关系的問題’的。第二，他又使人理解到在階級鬥爭發生以前，人們是根本不發生‘思維對存在’的問題的，人們的思維中根本沒有唯物與唯心的矛盾的。另一方面當人類社會中階級消滅以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的問題，唯物與唯心的矛盾，卻將絕對不存在了。”他還說：“听信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話，那麼我們的抽象的‘階級性’和‘党性’，也許會非常之強，但是，我們之得於自然科學的簡單常識卻完全拋棄了，我們的首尾一貫的邏輯方法也只好完全拋棄了，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我們是無法讀通了，而對實際生活尤其無法理解了。”徐懋庸真是那樣“好心腸”的人嗎？他居然擔心，如果听信了世界觀有階級性和黨性的話，就會發生誤解，誤解到“沒有人類的時候”也是會有哲學的。恐怕只有唯心主義者或瘋子才會發生這樣的誤解，唯物主義者或思想正常的人連想也不會想到的。難道世界上沒有徐懋庸，竟有一個思想正常的人會想到與徐懋庸爭論嗎？這個誤會是會發生的。第二種和第三種誤解也不會發生的，因為我們同徐懋庸爭論的是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世界觀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當時並沒有涉及階級鬥爭發生以前和階級消滅以後的問題。徐懋庸否認世界觀的階級性和党性，就是想從根本上“修正”馬克思主義，想使人相信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性和党性，但這是辦不到的，即使再寫一百篇文章，也只有更加暴露他反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而決不會使人相信他已經“讀通”了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相信他對實際生活有所理解。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結論中指出：“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按其實質來說，是兩個鬥爭着的黨派，而這種實質被冒牌學者的新名詞或愚蠢的無党性所掩蓋着。”①徐懋庸

① “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79頁。

正是用“冒牌學者”的名詞和“愚蠢”的超階級觀點來掩飾着他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忠誠地為資產階級服務。我們同徐懋庸之間的鬥爭，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鬥爭，是黨派鬥爭，即共產黨同反共產黨之間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右派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同徐懋庸之間的大是大非。

至於說到在將來沒有階級的社會里，是否還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矛盾，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見解：“只要還存在着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着先進和落后的矛盾，還存在着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麼，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①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種新的发展；但是這種发展与徐懋庸的謬論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矛盾有認識的根源和社會的根源，這兩種根源是結合着的。認識的根源，也就是在認識過程中會產生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因為主觀反映客觀要有一個過程，如果能循着正確的思想方法去認識，即依照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去認識，主客觀就能達到一致，即使發生錯誤也容易糾正；如果循着錯誤的思想方法去認識，即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去認識，主觀就不可能正確反映客觀，就談不到主客觀的一致了。但一個人怎樣才能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呢？這就要考察社會的根源。每個社會都有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凡是先進的力量，是要擁護生產力向前發展的，落后的或反動的力量則阻礙生產力發展。在

①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7頁。

階級社会里，这种矛盾就表现为階級斗争；在階級消灭以后，階級矛盾不存在了，但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仍然存在。先进的力量，必然拥护正确的思想方法，即辯証唯物主义，而落后的力量或思想僵化的人就会离开辯証唯物主义，走上唯心主义的道路。这个理論問題，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徐懋庸認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有了人才有的”說法，不是使問題前进一步，相反，他是由明确回到模糊，由具体的階級性回到抽象的“共同人性”，显然是一种倒退的反动的見解。中央的文章把馬克思主义发展了，把沒有解决的問題解决了。徐懋庸則把已經解决了的問題却重新弄糊涂了。在階級社会里，他認為世界观沒有階級性，这显然是反动的。

徐懋庸这种反动的超階級的观点，貫徹到他所有的文章中。他在“过了时的紀念”一文中，公然提倡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性論，認為資產階級同无產階級有“共同的人性”。这种观点，也成为他写杂文的理論准則。徐懋庸在“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現在”一文中說：“我曾給自己規定，文章中要‘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该有点儿自己的风格’。”这里边就是不敢談“有点儿立場”，不談立場就有明显的立場，徐懋庸是坚决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动派的立場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写他的杂文的。否定階級性和党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正象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象一条黑綫貫穿在他的一切文章中，我們批判徐懋庸必須抓住这一条綫索。

二、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

徐懋庸曾經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来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前面所說，徐懋庸模糊階級的界限，同时也就是模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徐懋庸在这方面的花样还有

很多。

徐懋庸在第五中級黨校討論哲學的基本問題，即物質與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時，曾經舉了無數例子來混淆物質與精神的界限，他說：“小說對生活說是第二性的東西，但它是物質”；“憲法的觀點是意識，憲法本身是第二性的，但它是物質”；“肚子很餓，饅頭出籠，流口水，饅頭是第一性的，流口水是第二性”；“老子是第一性，兒子是第二性”；“你動手打我，是第一性的，我回手打你，這是第二性的，打官司，先動手打人是第一性，後動手打人是第二性的”。他還說：“我以為，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兩個概念，一般地不過表示了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表示兩個事物中那一個是根本的或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第一性的）；那一個是派生的，或次要的，被決定的（第二性的），表示沒有前者就不會有後者。哲學的根本問題或最高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只在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或最高問題的限度內，唯物主義才確定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問題恰恰是在我們討論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的根本問題時，徐懋庸提出了上述的謬論。因此，徐懋庸在這種場合，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謬的論點，除了解釋為有意去模糊思維與存在、物質與精神的界限，也就是模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之外，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1955年6月，徐懋庸在題為“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的一個報告里，又提出了三條區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

“（1）凡我們腦中所想的事情，客觀上是不是一定存在？……

凡腦子中所想的東西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這個答案就是唯物論，這茶杯我腦子裡存在，實際上也存在……而有些天堂不存在，這叫做唯物論……凡我腦子裡有天堂一定有天堂，腦中有鬼，腦中有孫悟空一定有孫悟空，那就是唯心論。

“(2) 我的脑子里有了的东西，实际上都有的，脑子沒有想到的东西，实际很多。这問題，脑子所想的以外，还有許多沒有想到，沒有認識，这就是唯物論，而有的說脑中想到的就存在，我未想到的它就不存在，这是唯心論，如未見到苏联，未見過斯大林，就否認苏联和斯大林的存在……。

“(3) 实际上一个茶杯，脑子里一个茶杯，实际上不一致，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是脑子是真的，还是实际上是真的。如主客觀不一致，客觀是真的，我就放弃主觀，服从客觀，这是唯物論。

唯心論是說脑想的是真的，客觀上是假的……”

我們曾經对徐懋庸这种“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进行过批評。我們認為，徐懋庸不是教人去明确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而是教人混淆他們的界限。恩格斯对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別是非常明确的。恩格斯說：“凡断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构成唯心主义的陣營。凡承認自然界为基本起源的，則属于唯物主义的各派。”^①徐懋庸想出三条标准来“修正”恩格斯的原理，徒見其“脑中所想的”十分荒謬而已。徐懋庸的三条标准，沒有一条能够說明在思維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上，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徐懋庸是想用实物与幻想有区别；脑子所想到的以外，还有許多沒有想到；主客觀是否一致，这样三条来“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越“区别”就越糊涂了。我們曾經指出：徐懋庸这种区别方法，唯心主义者也会同意的。貝克萊就会同意徐懋庸的第一条，因为貝克萊也沒有否認实在的物与幻想之間有区别，只認為存在是“感觉的复合”，实物与幻想都是存在于意識之中而已；同时还会同意徐懋庸的第二条，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1頁。

因为他也是同意在主觀以外还存在別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上帝。第三条把主觀和客觀平列起来，去談他們是否一致，也沒有解決思維对存在誰先誰后，誰決定誰的問題。主客觀是否一致的問題，是認識過程中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思維与存在誰先誰后、誰決定誰的問題。只有承認存在先于思維、存在決定思維，才談得到思維是否正確反映存在，主客觀是否一致的問題。

徐懋庸的野心很大，他想把自己的謬論造成一个“体系”；他到了科学院之后，又專門写了一篇“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區別”，作为他的反党“哲学合作社”的“范本”。他把原来三条又“发展”为四条，还是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這個問題，关鋒同志在“徐懋庸的反动哲学”（发表在“哲学研究”第六期）一文中，已給予駁斥；另外，还有其他同志将另写专文来駁斥，我在这里就不詳細談了。我要指出的是，徐懋庸無論提出三条或四条标准，其目的无非想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来达到从哲学的根本問題上“修正”馬克思主义。企图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就是企图混淆无产阶级的世界觀与资产阶级世界觀的界限，也就是企图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敌人用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共同手法。徐懋庸采取的也正是这种手法。但是徐懋庸这种卑鄙目的，显然是徒劳的。

三、反真理的真理論

徐懋庸除了在世界觀的阶级性問題和在哲学的最高問題上“修正”馬克思主义以外，他还企图在認識論問題上，特别是在真理論問題上“修正”馬克思主义。徐懋庸在“实践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論”那本小册子中有一节討論“真理与錯誤”的問題，他根本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反映論，并繼續貫徹了他的超阶级

的論點。他說：“真理是干出來的，勝利是干成功的，廣大人民好好地干，那怕社會不改造，全人類一齊好好地干，那怕自然不降服。”我們黨當然也是提倡要好好地干，提倡要有革命干勁的；但是這個干勁，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之下，才能接近真理，得到勝利，而不是象徐懋庸所說的，無論什麼人，只要“好好地干”，也不管你怎樣蠻干亂干，也可以“干出真理，得到勝利”；只要“廣大人民”好好地干，就可以改造社會；只要“全人類一齊好好地干”，就可以降服自然。在這裡，我們仿佛又听到了蔣介石的力行哲學的謬論。蔣介石不是叫喚過要“苦干、實干、硬干”嗎？結果干出什麼名堂來呢？只有越干罪惡越大而已。

在徐懋庸的心目中，既沒有階級，也不需要黨的領導，他的口號是“全人類一齊好好地干”，好象現在已經是共產主義世界了。過去我們又曾听到過“國民一體”，“可以征服大東亞”的狂言，一听就知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說的；可是徐懋庸也有類此的高見，真不愧為反動派的一名吹鼓手了！

徐懋庸還告訴別人如何獲得真理的具體辦法，他說：“人們的認識和實踐，都是從最切近最細小的客觀事物開始的。所以人一開頭只能做小事，而且必須做小事。在做一件小事的時候，懂得了這件小事的各方面的道理，根據這些道理終於把這小事做成功了，這樣就得到個別的經驗，這一個別的經驗，僅僅對於這件小事而言，可以說是真理；……”“但無論那一種人，都從做小事情入手。在做了許多小事情懂得許多小道理，從許多小道理中總結出大道理之後，才做得大事情。……普遍真理是個別經驗積成的。”徐懋庸不承認真理是客觀實在及其規律在意識中的反映，實際上是否認世界的客觀規律，用人們本身的“經驗”來代替這種規律。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了實用主義的再版。實